

从边城走向世界

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凌 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

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研究者丛书

凌宇

1985·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研究者丛书

第二种

责任编辑：冬 晓
装 帧：晓 吟
叶 雨

从边城走向世界
CONG BIANCHENG ZOUXIANG SHIJIE

凌 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71,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800

书号 10002·62 定价 2.30 元

題　　辭

本书论及的是这样一位作家——

他是一个对人生怀有极大热情的人，在内心深处，
却是一个孤独者。

他常常叹息着不为人理解。

我愿意去理解。不是为着褒扬，也不是为着贬斥。
在高层次的思维里，没有简单的善恶与好坏之分。

——这不是无是非观。任何人都将接受人类理性
法庭的最终审判。

我不想也无能充当审判者。但我愿意说出我所知
道的真实。

不能说我已经说出了全部真实，
因为，这仅仅是开端，而远非终结。

一九八五年一月九日

目 次

绪 论 ······ ······ ······ 1

第一章 他走着一条孤独的 人生之路 ······ ······ 26

- 一 混沌的生命被戏弄于命运之手 ······ 27
 - 1. 沈从文的家族 ······ ······ 27
 - 2. 顽童生涯 ······ ······ 29
 - 3. 注定的“必然”将他驱向不可知的人生漩
 涡 ······ ······ ······ 35
 - 4. 生命颠簸于不能自主的人生浪峰之间 ·37
- 二 慄然醒悟后的反思 ······ ······ 46
- 三 “独立”地支配自己(上) ······ ······ 52
 - 1. 诀别与追求 ······ ······ 52
 - 2. “红黑”碰壁 ······ ······ 59
 - 3. 幸福与孤独为邻 ······ ······ 63
 - 4. 痛苦与希望同在 ······ ······ 68
 - 5. 一个尚在继续的长长尾声 ······ ······ 72

III

四 “独立”地支配自己(下) ······	78
1. “怀疑”与“取证” ······	78
2. 同三十年代左翼文坛 ······	84
3. “反对作家从政”与“反英雄崇拜” ···	94
4. 孤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 ······	98

第二章 人生奥秘探索者的 得与失 ······ 102

一 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 ······	103
二 越过现存观念的道德观照 ······	112
三 生活与生命——人生不调和的 两个基因 ······	121
四 “入世”与“出世”的激烈内心交锋 ···	130

第三章 对艺术美的潜心研 究 ······ 140

一 美在“生命” ······	141
二 艺术创作在“独断” ······	149
三 将“道理”包含在“现象”中 ······	160
四 “情境”——触发美感的弦索 ······	167
五 “恰当”——技巧运用的准绳与归宿 ·	173

第四章 沈从文建造的文学 世界(上) ······ 181

第一节 沈从文小说的早期风貌 ······	182
-----------------------	-----

第二节 沈从文小说的人生视景	195
一 沉落的都市面影	195
为“上等人”“造一面镜子”	196
I、?与……	201
泥涂里的道德光辉	206
二 生命多方的乡村世界	211
跃动着的原始生命活力	212
与世浮沉的乡村灵魂	218
巨压下的性格变异	225
向生命的神性凝目	234
(一)《边城》论	235
(二)《长河》论	246
三 乡村与都市的交流	255
老乡村儿子的哀乐	256
自然天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262
卑贱者的脊梁	267
第三节 四种不同美学风格的艺术创造	272
一 讽刺的绘真	274
二 浪漫的传奇	280
三 忆往的写实	285
四 象征的抒情	292
第四节 意境·心理刻划·语言·文体	299
一 意境	299
二 心理刻划	308
三 语言	315

四 文体	323
第五章 沈从文建造的文学	
世界(下)	332
第一节 沈从文散文演变轨迹述略	333
第二节 充满时代与历史感兴的生命	
协奏曲	343
一 大时代中小知识分子的浮沉	343
二 滔滔长流上的人生悲欢	357
第三节 《湘行散记》《湘西》的艺术创造	373
一 诗自生命深处自然流出	373
二 神游古今的情感音响	379
三 散文长卷的文体独创	384
结 论	390

绪 论

不曾戏弄历史的人，终究不会受到历史的戏弄。

1 在经历了多年的浮沉、冷遇及近几年的褒贬不一的评判之后，历史已将科学评价沈从文及其文学成就的课题，提到了人们面前。

作为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自一九二二年从湘西一个偏僻的山城，独自走到北京，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有整整六十个年头。六十年来，这个具有苗族血统的作家，不仅早已蜚声三十年代文坛，被视为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①，而且从那时开始，便超越国境，走向世界，为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关注。一位英国的作家在谈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时说过，“一种能够产生鲁迅、闻一多、沈从文的文化，不需要谁来为它辩护”^②。一个美国的沈从文研究者，用充满热情的笔调写道：“先生的代表作品是世界上好多文学学者永远要

① 鲁迅与斯诺的一次谈话，见尼姆·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

② [英]W.J.F. 詹姆尔：《现代中国文学能否出现？》，载《编译参考》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看，而且要给自己的子女看的”^①。在国内，沈从文研究也打破了近三十年的沉寂。然而，也有人将这视为一种反常现象。这正相矛盾的议论，已使不明底蕴的读者莫所适从。显然，无论是空洞的褒扬还是缺乏论证的贬斥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历史向研究工作者提出了要求：面对全部有关的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判与论证。

也许，进行这样的研究真是时候了。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当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尚处于它行程中的每一点的时候，一切都仿佛是浮动的、难以把捉的。诸多必然的、偶然的因素错综在一起，以难以卒料的形态呈现出千变万化，它还未获得完全的确定内容，即是说，它还未具有质与量的完全而丰满的规定性。可是，当新的发展已明确无误地宣告先前这个阶段已经过去，并开始成为陈迹的时候，先前那个跃动的历史过程在一瞬间仿佛凝定了，就是说，在它的内部，不会再有新的质与量的变更，时间与空间将它内部的每一具体内容固定在某一特定位置上，即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纵横交叉点上。这时，文学史家便获得了远比身处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预言家们优越的地位。他不必为有可能出现某些出乎意料的新因素而坐卧不宁，他面对的是获得了各自规定性的完整的事实材料；他也不必为层出不穷的新事变弄得激动不安、应接不暇，他已有可能对全部历史现象做出冷静的审视和凝神观照。

然而，历史研究并非历史现象的简单复印，不是事无巨细的全部感性材料的堆积。而且，任何历史现象就其本身看，它诉诸

^① 金介甫：《给沈从文的一封信》，《花城》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人们感官的也只是它的外在面影。它为什么会出现？从哪儿来？又以它特有的影响走向哪里？在它与其它现象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又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必然性？当我们从这里出发，试图对沈从文及其文学活动进行分析时，就仿佛触动了一部构造复杂的庞大机器的开关，在这一瞬间，这部机器的所有部分全都运转起来。不，它远比单纯的机械运动复杂，因为作为文学活动，是以人的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并在极大程度上渗进了作家生命过程的有机的精神活动。沈从文不是“天外来客”，他和他的文学活动终究不过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全部文学现象，无论巨细，也全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纯粹偶然的现象只是子虚乌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沈从文既不是共产党员，甚至连左翼作家的历史身分也没有。但是，研究对象的确立，并不能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研究并不意味着肯定，当然更不仅仅是颂扬。我们的研究应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从广阔的历史视野出发，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学在历史上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这种存在的一切内因和外因是什么？它对这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心理产生过什么影响？依照其内部矛盾诸方面的运动，又会将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心理引向什么方向？唯其如此，才能引出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正确结论。因此，文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必须以其在上述诸方面所具有的典型性的程度而定。

从这个高度出发，鲁迅与郭沫若理所当然的具有勿庸置辩的典型性。他们的文学活动显示了作为封建阶级“逆子贰臣”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向无产阶级的诤友和战士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有某种农民气质的鲁迅与更多地带有城市小资产阶级气质

的郭沫若在这种转变中，又显示出怎样不同的表现形态；从这个高度出发，闻一多也具有典型性。他的文学活动勾画出一个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薰陶的知识分子，如何最终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的鲜明轨迹；从这个高度出发，即便胡适、周作人，也同样具有典型性。从胡适的历史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头脑浸透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如何从新文学初期的改良主义走向与封建势力妥协，以至于成为国民党文化官僚的最终归宿；从周作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个五四初期的封建阶级的“叛徒”，由于骨子里潜伏着的“绅士鬼”如何驱使他逐渐成为醉心于“花草虫鱼”的隐士，以至最后堕落为汉奸的历史过程……。作家的人生道路与世界观的演变尚且如此，更不必说他们的作品创作就其艺术风貌着眼，还有着相对独立的内部规律，作品的影响越大，作用于后来文学发展的因素越多，其研究价值越大。越过对历史人物及现象的好、坏的简单评判，我们便明显地感觉到隐伏于这种必然性之中的巨大历史教益。这种教益，对我们民族文化目前及未来的发展，是价值无量的瑰宝。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从沈从文及其文学活动中，窥见到了一种鲜明突出的典型品格。

为了说明这种典型品格，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在二、三十年代的发展轨迹。

一九一七年前后，中国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虽然在这之前，中国文坛已经生长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的萌芽，但由于先天不足，它带着外貌的纤弱与筋骨的疲软。到五四前夜，无论是封建文学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都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学提出的审美需要，一场文学变革势在必行。到一九

一七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应运而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从内容到形式，向文学提出了变革的历史要求。这所谓新道德，是以肯定个性、张扬民主、维护人权以及反帝爱国为基本内容的，它与封建阶级压抑人欲、摧残个性、维系专制的旧道德尖锐对立。虽然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使这场变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力度，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质因素并没有成为主流。正如郁达夫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①。一九二五年前后，虽然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也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讨论，并未产生相应的作品”^②。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尤其是随着一九三〇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结束了一九二一年文学社团纷起的局面，中国现代作家形成了三大作家集群。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作家群，二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作家群，三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国民党作家群。左翼作家发展了“五四”精神中的革命部分，他们以“无产阶级文学”为旗帜，将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纳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轨道；国民党作家则从根本上背离“五四”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精神，扯起“民族主义文学”的招牌，将封建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中的腐朽部分糅在一起，以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目的；北方作家却承袭了五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四〇年版。

② 沈雁冰：《一九三五年记事——回忆录（十八）》，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四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精神财产。在三十年代国共两党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一方面，这种民主主义与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国民党反动的独裁统治和思想禁锢政策相冲突，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无产阶级革命抱有程度不等的怀疑和不理解，在政治上走着一条中间道路。但中间道路绝非纯粹的不偏不倚。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与左翼作家同处被压抑的地位，这决定了他们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文化战线上，必然成为左翼作家的同盟军。这个作家群对三十年代为数众多的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但又一时找不到出路、在人生道路上感伤和迷惘的文学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上述三个作家群的出现及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或联系，构成三十年代错综复杂的文学情势。那种对三十年代文坛所做的非左即右、非革命即反革命的描述，显然不符合三十年代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

追踪沈从文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思想轨迹，我们惊异的发现，沈从文一直固执地坚守着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信守着看人论世的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任凭政治风云变幻，他抱定自己的信念，一动不动。当政治潮流漫向右边，他仿佛站在左边；而当河道更移，水流冲向左边，他仿佛又成了右翼。政治上的行情涨落丝毫没有更移他的立场。“识时势者为俊杰”，他却那么不识时势。这带来了他严重的局限性，却也显示了他思想品格的某种可贵性。无论人们对此做何评价，有一点却是明白的，即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这种思想品格正是一种罕见的典型。随着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影响的扩大，这种典型性愈加引人注目。

沈从文的文学活动始于二十年代中期。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他不过是一个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小兵”。其创作虽然显

示出某些崭新的色彩，却还比较幼稚，影响也不大。到一九二七年以后，尤其是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沈从文的创作日趋成熟，开始成为北方作家的重镇。朱光潜这样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①。姚雪垠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人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的文坛的重镇。”^②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道出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史实。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沈从文主编了《大公报·文艺副刊》，这是三十年代影响极大的文艺刊物之一。从这个刊物上，我们可以读到许多现代著名作家和诗人最初发表的作品的名字。为着扶持文学新人，他认真而耐心地给青年作者看稿、改稿，这占去他的许多时间，乃至不得不停止自己写作《十城记》的计划^③。

沈从文在三十年代的巨大影响，并不仅来自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居的地位，而是更多地来自他的创作本身。这不仅由于他的作品的思想情感集中地代表了三十年代北方作家的共同倾向，而且因其题材的多样性、风格的独特性及创作方法、艺术表现形式异乎寻常的丰富性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文学青年的目光。^④许多人最初走上文学道路，就是从接受沈从文的影响开始

① 《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载《花城》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② 《学习追求五十年（一）》，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③ 见《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载一九八〇年第四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的。当时就有人指出：“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读者，照亮了通到文学之园的途径。”^①而且，这种影响并没到现代文学终结而止，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当代作家的创作。当沈从文的名字终于不再成为一种忌讳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越来越多的作家关于自己创作承受沈从文影响的公开申明。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创作仍然没有减弱它的魅力，具有活跃的生命力？那些承受过他的影响的作家，固然没有承袭他当年的政治立场。可是这种影响仅仅是沈从文作品形式方面提供的某些成功经验吗？抑或也包含了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合理而积极的因素？而沈从文的思想形成究竟具有哪些社会历史与个人经历的内在必然性？只有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以后，我们才能找到沈从文及其文学活动典型品格的全部内涵。

2 在三、四十年代复杂的文学环境中，沈从文在政治上属于既孤立于左翼文学运动之外，又拒绝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民主主义作家。只要肯面对历史事实和有关沈从文历史活动的全部材料，得出这个结论并非难事。然而，直到今天，有的人还宁可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历史，把沈从文描绘成始终站在左翼文学运动对立面的右翼文人；在国外，有人特意将沈从文打扮成共产党错误的批评家，似乎沈从文从来就与他们处于反共的同一政治立场。可是，在这种种批评声里，我们听不到支持各自论断的完全的事实根据。关于一个作家政治历史的喋喋不休的议论是够令人厌烦的，本来可以把这种精力用于作家作品的研究。然而，问题既经提出，我们也就无法绕开路走，某

^① 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载一九三五年四月《新中华》一卷七期。

种分辩也许是必要的。

沈从文在解放前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文学活动中，究竟在政治上是不是反共的？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反共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沈从文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从事过反共的政治活动？回答是否定的。从一九二四年步上文坛，到全国解放基本上终止文学创作，沈从文的全部历史活动没有展示他参与任何党派和政治集团活动的任何迹象。沈从文正是以这种无党派作家的身份著称于世，他也曾以此自诩。他不曾加入国民党，不曾担任国民党政府下的任何官方职务。在三十年代，他曾被湖南推为省参议员，但却遭到他轻蔑的拒绝。抗战时期，他转移到云南，从事抗战的文化工作，在他这一时期发表的大量文字里，我们感受到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与热情，连半点抗战无望的消极色彩也没有。抗战胜利以后，他复员到北平，仍然从事教学与文学编辑的老行业。这期间，中国历史舞台上曾出现过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派别，但他与这些政治派别无缘，始终与政治党派保持距离，完全符合沈从文思想发展的逻辑。

如果从思想上着眼，从沈从文的历史活动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清朝政府、军阀势力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批判者的形象。他的文学创作，鲜明地表现出他对中国从近代直至四十年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基本态度。他不仅愤怒控诉过清政府和军阀势力对湘西苗民和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①，强烈批判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肆行屠戮^②，深刻地表

① 可参阅《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沈从文小说选》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等作品。

② 见《菜园》《新与旧》（《沈从文小说选》第一、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等小说。